

· 明伦学术书系 ·

现代性与古典传统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

武新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明伦学术书系 ·

现代性与古典传统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

武新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
武新军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1

ISBN 7-81091-388-3

I. 现… II. 武…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976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责任印制 王 慧
封面设计 张 胜
版式设计 谢景和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81091-388-3/I·249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武新军 1974年生于河南安阳。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河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现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求学期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研究项目两项。编著有《聚焦二十世纪——周大新文学评论集》，“新课标中学语文目标阅读”丛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先后获侯镜如奖学金、汪氏文科基础奖各一项。

序

吴立昌

本书副标题《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是作者论文原来的题目，去年初夏，该文以史料的厚实、理论的深刻而被答辩委员会专家一致评为优秀博士论文，以至有专家因论文而想把人留下。现在成书，自然又有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而其两大优点亦更显明。

新军的“后记”讲他在读硕士学位时，老师们就严格要求他将阅读几十种原始期刊作为研究的起点，从河南大学许多老师的学术著作中，我也感受到这种建立在牢靠史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朴实学风，因此，它不只是某位老师对学生的特殊要求，而是河南大学代代相沿的优良传统。新军不忘这一传统，在复旦读博期间仍然坚持走这样的学术研究之路。换了新的学习环境，他非常珍惜这里的一切。我觉得，学校和老师都在其次，重要的是要珍惜上海这个得天独厚的大环境。上海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现代化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一直走在全国最前面，它的现代的文化底蕴和史料资源也最为丰厚。处此环境，新军可算是如鱼得水。三年来，他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沉浸在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史料海洋里，吸收，积累，钻研，思索，他阅读的原始期刊远远超过原来计划规定的范围，思考的问题既深又细，对他提出的某些资料或理论方面的问题一时答不上来的情况，我就不止一次碰到过。

相对于谈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谈论古典主义确实不多，新军不仅从理论上早就对此有所关注，而且对古典主义或他提出的“古典倾向”所向往追求的那种人

性和道德的理想化境界也心仪已久，甚至成了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作者是充满着感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倾向”这个问题的。充满感情可以增强研究理论的动力，“笔锋常带感情”，更易将抽象的理论文字写得有声有色。不过，理论文章毕竟不是抒情散文。难能可贵的是，新军为文，虽带感情而有文采，但并未被感情所淹没，而是“情”与“理”相得益彰，站在自己所心仪的对象之外之上，通过客观公正的阐释、审视和分析，从而作出切合实际的科学判断和结论。这也是最能体现本书理论力度之处。

具有“古典倾向”的现代作家，更多的是回顾而不是前瞻。然而，前瞻也好，回顾也好，都立足于对现实的不满和遗憾，都需要寻求某种变革或弥补的方式和途径，只要有所追求有所憧憬，也就必然包含着某种浪漫情怀。前瞻所及，多为未成现实的理想，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回顾的对象则已经是过去的“存在”，如何认识和评判，虽然人言人殊，但史实却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不管是“古典倾向”作家留恋回顾的遥远的古代，还是他们所处的“现实”，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皆是历史，因而特别需要新军所体会的，“以理想的眼光从事学术研究，最忌缺乏历史意识的寻章摘句的高谈阔论”中的那个“历史意识”，我以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陈寅恪虽然与马克思无关，但他在肯定三纲六纪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后，又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正是他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之处。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以“历史意识”贯穿始终的自觉性。作者在充分肯定“古典倾向”作家从“道德性”“审美性”对抗现代性危机追求人性“和谐”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道德性”“审美性”并非超越现实的抽象存在，“对抗”不等于取而代之，历史还得沿“现

代性”路径向前，只能战胜“危机”而不可折回。作者深知历史发展规律不可违，并指出“古典倾向”作家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的尴尬命运：“在一个‘乱世之音怨以怒’的时代，在一个虎狼成群风沙扑面的时代，在一个追求自由和解放为主旋律的时代，他们标举出中和之美的旗帜，试图以文学缓解时代的震荡，时不时地对‘舒愤’之作加以指责，这是明显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也注定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弱势地位。”

“古典倾向”作家以学衡派最为突出。作者在阐释论述他们于新文学运动具纠偏之功的主张和追求时，虽不乏赞赏之词，但他仍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准确揭示了学衡派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对学衡派批判浪漫主义时所显现的对人欲的恐惧，作者认为他们没有正视“欲”的复杂性和合理性：“除了他们所指责的堕落为兽的冲动外，人类追求知识、幸福和个性解放的愿望，也是人欲的一部分，在当时，这部分实际上更应得到重视和强调。”接着便在这个问题上将学衡派与五四文化先驱加以比照，进行分析：

“五四”先驱大胆肯定人的欲望，是根源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想改变中国一潭死水的现状，而学衡派对欲望的否定，则根源于民族文化的危机感，想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在欲望与理性的天平上，强调任何一方，或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都注定要以某种偏执为代价。因为这不是一个纯粹思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去才能对它做出回答，也就是说，哪一方能够抓住时代的症结，哪一方更具有更多的历史合理性。如果我们还尊重历史的话，我们就应该把选票投给那些新文化先驱者们；因为他们确实更多地把握了时代的整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想保存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并不能保存我们”。单就文学问题而

言,学衡派在对新文学重情抑理的极端浪漫趋势的制衡上,在对西方文学较为冷静的审视上,是有其贡献的。但他们的古典与浪漫(情与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难免存在简单化倾向;对欲望的恐惧与节制,使他们看不到新文学家求新求变求自由求个性解放之“情”的现实合理性,使他们失去了与变革的现实对话的权利;对“理”的推重,使他们忽视了人类非理性层面这一至为宝贵的艺术源泉,以及西方文学走出古典主义后,在这一源泉浇灌下在艺术方面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我之所以大段称引上文,不仅因为它很有理论深度和逻辑力量,体现了新军在运用历史意识从事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可喜进展,而且他在指出当年学衡派“以偏纠偏”的同时,对我们今天重评学衡派也有不少启示意义。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客观,“全面”、“完美”云云,也只是相对的。学衡派的“偏”,就在他们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得十全十美,并以此纠正论辩对方的偏激和片面。如果我们今天将学衡派当作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完全相反的“全面”的代表大唱赞歌,甚至认为学衡派的学术方法和态度是对现代中国所贡献的最光辉的思想,代表着一种不可偏离的学术路向,那岂不重蹈学衡派当年“以偏纠偏”之覆辙了吗?看来对于历史,研究也好,重评也好,历史意识是须臾不能离开的。

深度和新意往往不大能分得开,深入钻研,钻到一般人未曾企及之处,或能摒弃、超越积习难改的思维模式时,自然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希望《现代性与古典传统》的作者沿着这一学术路向继续走下去。

2005年3月24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吴立昌(1)
绪 论	(1)
一 “现代性”视野中的“古典倾向”	(1)
二 “古典倾向”与“古典主义”的异同	(7)
三 论述的范围和思路	(11)
第一章 新人文主义、新批评派与中国现代文学	(15)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的源流及其“古典倾向”	(15)
第二节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26)
第三节 早期新批评派与中国现代文学	(42)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	(55)
第一节 “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55)
第二节 “古典倾向”者的追求及其境遇	(66)
第三节 “古典倾向”者的批评实践	(76)
第三章 “古典倾向”者在新旧文学之间	(108)
第一节 道和美:文学进化论的盲点	(108)
第二节 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	(114)
第三节 对“主情”(纯文学)文学史观的反思	(122)
第四节 填补鸿沟:创造新文学与研究古文学并重	(128)
第四章 “古典倾向”者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34)
第一节 介入政治的方式:道德、审美与文化	(134)
第二节 调和文学与政治的距离:道德与审美的合力	

.....	(149)
第三节 人生、人性的完整性与文学的概念化	(158)
第五章 “古典倾向”者在文学与道德之间	(165)
第一节 “五四”后的道德状况和道德理想	(165)
第二节 文学审美论和道德论的冲突	(175)
第三节 文学批评:鉴赏还是判断	(194)
第六章 “古典倾向”者在文学与科学之间	(206)
第一节 科学的进击与文学的防御	(206)
第二节 科学崇拜压力下的困惑	(211)
第三节 对科学的文学批评观的反思	(223)
第四节 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	(232)
第七章 “古典倾向”者在诗、文、乐、画之间	
——对“纯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反思	(241)
第一节 诗与画:纯文学之争的理论焦点之一	(243)
第二节 诗与乐:纯文学之争的理论焦点之二	(253)
第三节 诗与文:诗的文体之争的理论焦点	(259)
第四节 对中国现代文学型类混杂的思索	(266)
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77)

绪 论

在“名词轰炸”的潮流中,继续凭空制造新名词,是件令人生厌的事。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常会遇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使用原有的概念,无法真正逼近研究对象),在面对无法用原有概念描述的现象时,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寻找新的名词。“古典倾向”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因此,在展开论述前,先谈谈我对“古典倾向”的理解,以及论文的范围和思路,以此作为本书的绪论。

一 “现代性”视野中的“古典倾向”

在淡化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性评价标准后,“现代性”的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被非常广泛但又非常不严谨地使用着。翻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论著,我们发现,有人把现代性看做一套理想的社会方案(民主、科学、进步等等),有人把它理解为一个既有正面意义又有负面影响的客观发展历程,更多的人则在现代性的动机和后果、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之间犹疑徘徊。可以说,使用“现代性”这一人言人殊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来研究现代文学,在扩大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分化。

先来看“现代性”这一概念。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现代性”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其基本特征“是一种持续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①。在“现代性”世界里,人们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的憧憬”^②。无论“现代性”的倡导者还是现代性的反思者都承认,在现代性时间观念支配下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中,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思维层面上,表现为新旧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文化上,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在经济和政治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视历史连续性和社会秩序的激进革命思潮;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日趋严重的科学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即“人化物”的非精神化)倾向;在文艺上,表现为艺术与宗教、道德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生产的工业化和艺术消费的商品化,媚俗艺术的大量出现,超时代的审美理想被即时性的感官享乐所取代等等。

面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强调现代性内部所包含的自我批判和改进的机制,譬如,吉登斯把对现代生活的反思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③卡林内斯库提出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反抗世俗现代性。^④受西方影响,中国的学者也开始用“反现代性的现

① 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②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后简称三联书店),2000年,第146页。

③ 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④ 参考: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马泰·卡林内斯库把美学现代性理解为对立传统、对立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它自身(美学现代性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的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

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概念来分析中国现代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①应该说,这种分析方式并不会因为地域的差异而完全失效,因为,近代以来,尽管中国在现代化的程度上与西方有着不小的距离,中国的民族文化也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受到了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冲击,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不能不有所显现,特别是在上海等沿海城市,也就是说,那些中国的现代性的反思者和批判者,并非完全是在杞人忧天,而是有其部分的现实基础的。我们对此应该抱同情了解的态度,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激进的现代性追求所产生的偏差,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但令人不满的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时,那些带有“现代性”字眼的概念(并非概念提出者本身),仍然隐含着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倾向,更多地,在现代性中寻找现代性的对抗力量,未能充分揭示出传统文化资源在对抗现代性危机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力量,并不总是现代的精神资源,例如,审美主义被看做对抗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但它的产生是不能脱离古典文化资源的。康德、歌德、席勒等人的审美教育理想,佩特的唯美主义,都是从古希腊文化、文学中获取了灵感,而那些在德国古典美学影响下产生的极端唯美(感性至上)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丧失了批判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为艺术而艺术”堕入“为金钱而艺术”,正是因为放弃了古典资源中的某

^① 参考汪晖的《现代性问题答问》《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些精神准则；^①近年来，又有人把新人文主义作为反抗科学主义的重要资源，但新人文主义的产生，正是从古希腊文化、文学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等古典文化资源中获得了精神的营养；再比如，早期新批评派成员艾略特和瑞恰慈，他们的文学观念具有明确的反抗现代性危机的价值取向，然而谁又能否认古典文化资源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呢？——艾略特的《荒原》对现代精神荒原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激烈的批判，因此被公认为批判现代生活的“现代派”名作，但作者不正是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典故与现代精神荒原“同时共存”来传达其批判意识的吗？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学者，他们在强调艺术的自律性以反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时，不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乞援于古代艺术吗？面对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学界不断有人呼吁“回到马克思”，那么，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不也同样心仪于古希腊文艺的辉煌成果，并从中得到很大启示吗？

正如一位目光犀利头脑清楚的青年学者所指出的：在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仅是传统研究中那种不自觉的‘现代性的理念’可以带来本质主义的倾向，就是当下的自觉的现代性质疑也在一种新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中掩盖着历史本身的许多细节。”^②也就是说，当前的自觉的现代性质疑者，往往在“现代性”的概念中寻找反思现代性的力量，这是无法很好包容那些反思现代性的古典精神资源的，是无法清晰凸现出那些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资源的古典根源的，也是无法有效分析中国现代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矛盾的（有时反而遮蔽了这些矛盾）。毫不讳言，

^① 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翔实的材料全面描述了唯美主义走向审美物化和艺术商品化的过程，揭示了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合流的“另一幅面孔”。

^② 李怡：《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笔者提出“古典倾向”这一概念，意在尽力把古典精神资源这股（被“现代性知识体系”所遮蔽的）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力量揭示出来。在我看来，凡是通过诉诸古典以对抗现代性危机的价值取向，皆可称为现代文化中的“古典倾向”，现代社会的“古典倾向”者，可能认同也可能反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但他们绝不赞同把价值判断简单地建立在时间的先后之上，把“好与坏”和“新与旧”等同起来，因为他们知道新与旧之间并无截然的划分；他们可能认同也可能反对艺术与道德的分离，但他们绝不容忍反道德的艺术，因为他们相信存在着一种超时空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他们可能认同也可能反对固有的社会制度，但他们不能接受激进革命思潮，因为他们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他们并不盲目反对科学，但他们肯定反对毁灭宗教、道德与艺术的科学主义，因为他们是人文主义者。

再来看文学问题。在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的支配下，我们的文学思潮研究同样产生了某些缺陷。学者们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界限，像植物学分类那样划分得很清楚，对各种文学思潮的美学特征作出了非常清晰的界定，并努力勾勒出文学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些工作，对考察整个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流变，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容易产生两个流弊：其一，这种思潮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它偏重于勾勒文学思潮的变迁轨迹，容易使人产生后来居上的错觉，以致拼命追赶新潮，而不能对各时段的文学做出正确的价值评判，不能冷静地审视各时期文学在美学、精神上的贡献，以致遮蔽文学思潮演进的复杂性，不能真正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效地借鉴传统的资源为我所用。毕竟“文学批评中的各种思潮，也和各种文艺思潮一样，表面上看来，一个思潮和它的前承者与后续者如何矛盾，不能相容，假若能取一个超然的态度，将各种思潮当作一个有起有伏的有机连续，则我们将发现，他们实际上不惟不矛盾，且是虽似相

反而实相成的。后起的一个新思潮往往是前者的补充与改正”^①。尽管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摆脱单线式进化论的影响，力图全面认识文学思潮演进的复杂性，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创作还是很难完全摆脱“新旧对立”思维模式的制约。其二，当我们以这套理论品评具体作家作品时，难免无所适从。因为作家、作品（尤其是伟大的作家作品）都是复杂的精神存在，他们可能同时具备我们所说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因素，我们在具体分析时，很难对其进行清晰的厘定，很难套用某种“主义”的标签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正如李健吾所言：“一个名词不是一部辞海，也不是一张膏药，可以点定一个复杂的心灵活动的方向。”^②梁实秋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古典的、新古典的、浪漫的，这些名词，严格的讲，并不能概括一个时代、或一个作家、或一件作品，只能指着一种质地(quality)罢了。某一种质地特别显著，我们便唤这时候为某一时代……歌德当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健将，然而他晚年的见解却又是古典的了，密尔顿的失乐园是浪漫的，然而也有人证明它是合于古典史诗的条例。……‘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辞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这两种不同的质地可以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土同一作家甚至同一作品里同时存在。”^③由此看来，以任何清晰的概念（特别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现代性”概念）来界定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总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总会程度不同地简化作家作

① 常风：《书评家的限制》，《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② 李健吾：《篱下集》，《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③ 梁实秋：《文学批评论》，《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第232页。

品的复杂性、歪曲文学思潮演进的原生形态。为了避免这种缺陷，某些学者提出了“古典的浪漫主义”、“浪漫的古典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等概念，很明显，这些文学的概念力图摆脱盲目趋新的偏差，具有一种“融会古今”的价值诉求，能够较为切近研究对象的实际。如果我们把这种“融会古今”的价值诉求提炼为现代文学中“古典倾向”，并从“古典倾向”这一视角来观察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话，就会有益于我们发现那些被进化的文学思潮史观所遮蔽的东西，有益于我们认识文学思潮本身以及文学思潮演进的复杂性，有益于我们接近古典文学传统。下文将对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进行详尽的阐释。

二 “古典倾向”与“古典主义”的异同

笔者之所以拒绝使用“古典主义”这一现成的概念，一是考虑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存在纯粹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即便那些赤裸裸的复古主义者，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古典主义”。二是使用“古典主义”的概念，很难有效、准确地描述出现代文学中所特有的、与“古典主义”相似而不相同的文学现象。所以，辨析“古典倾向”和“古典主义”的异同，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给“古典主义”一个精确的定义，显然并非易事（欲了解“古典主义”这一术语在西方的涵义及其变迁，可参阅多米尼克·塞克里坦的《古典主义》一书。笔者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古典主义”观，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材料梳理），因为人们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用“古典主义”来概括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有人在使用“古典主义”的概念时，指的是17世纪模仿古希腊罗马的欧洲文